

## 历史

## 波克罗夫斯基与中国史学

朱慈恩

【内容提要】波克罗夫斯基是苏联史学的奠基人，也是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方法对俄国历史进行重新整理和诠释的历史学家。对于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史学、培养苏维埃第一代史学家以及建立无产阶级史学队伍作出了贡献。十月革命后，波克罗夫斯基的史学著作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其所倡导的唯物史观也同时在中国传播。波克罗夫斯基提出的“商业资本主义”和“专制主义”理论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重要概念，对中国史学具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唯物史观 商业资本主义 专制主义 政治批判

【中图分类号】K093/097.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2)03-0071-0007

波克罗夫斯基(М.Н.Покровский, 1868~1932年)是苏联著名历史学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895~1902年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其间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905年波克罗夫斯基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波克罗夫斯基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8年任苏维埃政府副教育人民委员。波克罗夫斯基是苏联史学的奠基人,也是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方法对俄国历史进行重新整理和诠释的历史学家。对于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史学、培养苏维埃第一代史学家以及建立无产阶级史学队伍作出了贡献。《俄国历史概要》是波克罗夫斯基的代表作<sup>①</sup>。列宁评价该书“结构和叙述都很新颖,读起来很有趣味”<sup>②</sup>。

### 一、唯物史观在苏维埃早期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

1918年开始,中国《新青年》杂志开始大量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情况。根据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最早向中国读者全面系统介绍波克罗夫斯基史学理论似乎应是1926年4月《新青年》杂志刊登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观——节译卜克洛夫斯基<sup>③</sup>俄国略史序言》(王伊维译)。波克罗夫斯基在此序言中较全面地介绍了唯物史观。他认为,“过去”、“现在”、“将来”是一脉相承的。研究历史的目的,正是为了探求社

① 陶惠芬:《波克罗夫斯基》,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7期。

② 《列宁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③ 民国时期,对于外国人名翻译并无统一规则,据笔者所见,波克罗夫斯基(М.Н.Покровский)的各种译名有卜克洛夫斯基、博克老夫斯基、布克洛夫斯基、波格洛夫斯基、鲍克洛夫斯基、波克洛夫斯基、波克罗夫司矶、包克洛夫斯基、波可老夫斯基、坡克洛夫斯基、朴克洛夫斯基、波克老夫斯基、波克里夫斯基等十余种(个别译名文中未曾引用)。新中国成立之初,仍然有沿用之前鲍克洛夫斯基、包克洛夫斯基、包克洛夫斯基等不同译名的情况。列宁在信函、文件中有多处都提及了波克罗夫斯基,自1955年《列宁全集》陆续编译出版后,中国学术界开始逐步统一译其为波克罗夫斯基。本文除引文以及原作署名外,一律作波克罗夫斯基,引文以及原作署名则按原有译名标注。

【作者简介】朱慈恩,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0LZUJBWZY033)阶段性成果最终成果。

会发展的规律性，“假使从现代社会追溯到过去的古代社会，那人类社会一切变换的规律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便能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作出恰当解释，更重要的是“预知这些变化的理法”，就能预知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能够对“将来”有所期待。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的历史观，也是解释人类历史的科学理论，因为“人类一切行为及一切历史，其根基在于物质的需要”。历史前进的动力则是阶级斗争，根基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预见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即“一切土地、生产产品、生产工具、工厂、作坊及运输资料、铁道等，均归‘工作者’之手”<sup>①</sup>。

苏维埃建立之初，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便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故此波克罗夫斯基把历史定义为是“解释政治的一章”，是“被推倒过去的政治”。鉴于资产阶级学者对历史学的歪曲，波克罗夫斯基特别强调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之于历史学研究的意义：“要了解历史，除了我们老生常谈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以外，没有别的道路”<sup>②</sup>。按照马列主义历史研究的党性要求，波克罗夫斯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的理论，1905年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失败的革命同时也是历史‘推动机’”<sup>③</sup>，使得1917年革命能够吸取1905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最后取得胜利。

20世纪30年代中国编译了不少波克罗夫斯基的著作，其中包括《俄罗斯历史大纲》、《俄国革命全史》（心弦书社1930年版）、《1905》（沪滨书局1930年版）、《俄国大革命前史》（上海海洋社1931年版）、《俄国革命运动史纲》（新生命书局1933年版）、《俄国历史概要》节译等。《俄国历史概要》是波克罗夫斯基的代表作，是他根据自己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授课时的讲稿写成的。这部著作以社会形态的发展为线索，阐明了俄国经济社会发展与阶级斗争的历史，对沙皇的反动统治与侵略扩张进行了批判。

《俄国历史概要》的阅读对象是普通民众，“这本书不需要读者具备任何初步历史知识……作者是为了这样的读者着想的”<sup>④</sup>，但该书并没有因为追求叙事的通俗清晰而降低自身的学术性，因此影响广泛。在此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颇显重要，正如《俄国革命全史》译者序中所言：“我们不仅看出了博克老夫斯基所叙述的俄国革命之经过的历史，并且，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学习怎样以唯物主义的眼

光去研究历史”<sup>⑤</sup>。

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指出，波克罗夫斯基“从研究革命以前俄国史学特征的叙事性政治史转向使用专门化的社会—经济研究方法”<sup>⑥</sup>。但是波克罗夫斯基的“经济研究方法”最明显的缺陷便是“商业资本主义”。所谓的“商业资本主义”是波格达诺夫在《经济科学大纲》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即把“商业资本主义”当做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独特阶段。波格达诺夫把人类历史发展分为“原始的自给自足社会”、“商业社会”和“社会化有组织的社会”，主要是从交换和消费的形式而不是生产方式的形式来观察社会发展史。波克罗夫斯基把波格达诺夫的“商业资本主义”理论首先运用到历史学领域中，“自从波格达诺夫造出商业资本社会是历史发展中之一个特殊阶段之谬说后，又有波克罗夫斯基接踵其论调，把商业资本当做是俄罗斯历史的中心”<sup>⑦</sup>。波克罗夫斯基把“商业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主义中分割出来用以诠释俄国历史，认为“商业资本，通常是假手于经济，经过市场而活动，不用‘非经济的强制’”，剥削独立的小生产者，不参加生产也不组织生产，只依赖于非经济压制的助力，故此商业资本和大地主的联合，“造成了一种有等级的专制的国家制度——此种制度，在俄国以至保持到二十世纪初叶”<sup>⑧</sup>。波克罗夫斯基把工业资本看成是商业资本的异己力量，前者是君主专制的反对力量，后者依附于君主专制，故此俄国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斗争的历史便成了俄国“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脉络，18世纪至1917年二月革命的历史便是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斗争的历史。工业资本依靠工人革命来反抗商业资本及其与大地主结合的俄国专制制度。1905年革命后俄国国家杜马和内阁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俄国绝对专制体制开始向现代资产阶级宪政的转变，并且产生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苏维

① 王伊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观——节译卜克洛夫斯基俄国略史序言》，载《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6年。

② [苏]博克老夫斯基、[日]石川一郎：《俄国革命全史》，潘既闲译，心弦书社1930年版，第3页。

③ [苏]布克洛夫斯基：《1905》，李麦译，沪滨书局1930年版，第362页。

④ [苏]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贝璋衡、叶林、葆熙译，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917～918页。

⑤ [苏]博克老夫斯基、[日]石川一郎：《俄国革命全史》，第1页。

⑥ [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⑦ 管听石：《中国史读本》，中华书局1950年版，第54页。

⑧ [苏]波格达诺夫：《俄国革命运动史纲》，吴季兰译，新生命书局1933年版，第3页。

埃。1917年工业资本在消灭专制制度的同时，也被其所依靠的工人阶级消灭。

波克罗夫斯基从“商业资本主义”理论出发，把商业资本判定为日俄之战的原动力，把二月革命看做是工业资本对商业资本的胜利的观点显然都是荒谬的。

对波克罗夫斯基史学的评价，不应该脱离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在苏俄建立之初意识形态斗争极其尖锐的背景下，波克罗夫斯基作为苏维埃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重新评价俄国历史、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波氏在“对贵族资产阶级史学作了激烈批评以后，又以经济唯物主义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sup>①</sup>。“商业资本主义”理论过分夸大了商业资本在俄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只能看成是“穿上半件历史唯物论外衣的半实验主义的历史理论”<sup>②</sup>。由此可见，波克罗夫斯基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交错混杂，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苏维埃早期历史学所处的时代特点<sup>③</sup>。

## 二、波克罗夫斯基与中国社会史论战

从1930年开始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引发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及斯大林、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争论密切相关，而社会史论战同样也受到苏俄的影响。社会史论战的焦点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以及秦汉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不少中国学者在对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讨论时，将波克罗夫斯基的“商业资本主义”理论以及后来修正的“专制主义”理论作为参战的理论工具。

在波克罗夫斯基有关俄国史的论著中，把“商业资本主义”看做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中心，“以致在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著述中，充满了波格达诺夫的俗见，虽然他在粉碎一般贵族和资产阶级历史家的历史神话这一方面有其不朽的功绩，然而终其身，跑不出波格达诺夫的圈套”<sup>④</sup>。拉狄克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则称中国商业资本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史，秦的统一就是商业资本的统一。社会史论战中的“商业资本主义”论者，“大皆渊源于波格达诺夫主义，以及渗入在波克罗夫司矶学派中的波格达诺夫主义的血液的流毒”<sup>⑤</sup>。力主“商业资本主义”的陶希圣把秦汉以后

的中国社会看成是后封建主义时期，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看成是前资本主义时期，无论是“后封建主义”还是“前资本主义”，其理论的根本点是在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插入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即“商业资本主义”。按照陶希圣的论述，中国自战国以后，已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战国以来，商业资本的发达成了瓦解封建制度的重要力量，战国后，“中国资本主义仍旧不能发生，不能发达到资本主义阶段”<sup>⑥</sup>。因为商业资本的发达，只是一种交换资本而非生产资本。而大土地所有、半奴隶的佃农以及封建地租等特征在战国以后依然长期存在。陶希圣把“商业资本主义”横亘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商人资本的发达，破坏国内市场，杜绝国外市场，促成大土地所有”<sup>⑦</sup>，商业资本和土地私有交互影响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经济构造。

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商业资本主义”论者的理论资源是多源的，除了波格达诺夫、波克罗夫斯基、拉狄克等人以外，金果尔和朴利果仁的《西方革命史》、库斯聂的《社会形式发展史大纲》、王纯一的《西洋史要》以及上田茂树的《世界社会史》、《民众世界史要》和《世界史纲》，都将“商业资本主义”独立出去。“商业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影响颇大，致使不少通史著作以及秦汉史研究专著都将这一理论加以发挥运用。在社会史论战中，新生命派的梅思平以及托派的李季、陈邦国、刘镜园等人，虽然观点互有分歧，并时有论战，但在基本观点上则是“同义异音”。

波克罗夫斯基起初对“商业资本”或“商业资本主义”的理解“十分明了”，“无丝毫的迷惑”<sup>⑧</sup>。但是波克罗夫斯基没有教条地坚持这一论点，而是逐渐地意识到了“商业资本主义”这个“旧定式犯着把这商业资本主义本身与商业生产混同的误谬”，“资本主义是生产的体系，而商业资本则并没有生产

① 刘大年：《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②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页。

③ 陶惠芬：《评波克罗夫斯基的商业资本理论》，载《世界历史》1985年第12期。

④ 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92页。

⑤ 吕振羽：《史学新论》，载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⑥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台湾食货出版社1977年版，第137页。

⑦ 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台湾食货出版社1977年版，第74页。

⑧ [苏]波格洛夫斯基：《俄国革命运动史纲》，第2～3页。



什么”。导致错误的原因在于没有把“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者结合起来，商业资本仅仅代表了一种交换关系，而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于是，波克罗夫斯基在摒弃商业资本是特殊社会形态理论的同时，又提出了“专制主义”理论，作为对其“商业资本主义”的修正。波克罗夫斯基首先把“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加以区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政治上的领主分权，是中世纪封建主义国家的典型特征。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起了分化瓦解封建经济体制的作用，在政治上必然会增加对专制集权的诉求，“在商品经济影响之下的封建国家的这种变化，即是专制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官僚底君主制度”<sup>①</sup>，官僚、雇佣兵和货币地租构成了专制主义的基本特征。专制主义立足于商业资本而得以成长，中世纪的封建国家转化为“官僚底君主制度”，封建领主则转变为专制君主。18～19世纪的俄国便是典型的专制主义。

上海神州国光社“读书杂志”派代表人物王礼锡和胡秋原吸收了波克罗夫斯基“专制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历史。其观点在该社出版的专号《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有所体现。

王礼锡把自秦至清中叶历史称做是中国社会形态发展中的“一段谜的时代”，解决这个“谜的时代”的关键，是“俄国大历史家波可夫斯基……正确地提出‘专制主义’的名称来解释俄国历史，这个解释是非常适合用来解释中国这一段谜的历史的”。王礼锡根据波克罗夫斯基有关“专制主义”的论述，认为商业资本虽然不属生产资本，但商业资本和封建经济一旦结合，就导致了自然经济的瓦解与专制体制的形成。在其看来，“春秋战国时代商业资本主义高利贷资本的惊人发展。土地资本的集中及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集中，把‘封主’与‘封奴’的政治经济关系都逐渐地打破了……适应着这些‘素封’的要求，而秦始皇的至上权威的专制主义政权予以建立”<sup>②</sup>。

胡秋原本来也是“商业资本主义”论者，但其后却主张“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有专制主义的存在”。胡秋原所说的“专制主义”，同样也来自波克罗夫斯基，“波克罗夫斯基用以指出俄国社会的表现——‘封建底专制主义’、农奴制底专制主义，这无疑也是中国先资本制的特征”<sup>③</sup>。胡秋原据此写作《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把秦至清作为专制主义社会时代，“我认为中国在鸦

片战争前相当于西方工业革命前社会，即专制主义（Absolutism）社会”<sup>④</sup>。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专制主义半殖民地时代，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前途是民主主义和工业化。

从波克罗夫斯基的“商业资本主义”理论可以看出，他本人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使用“商业资本主义”理论解释俄国历史更是缺乏理据。马克思早就指出，商品流通过程中呈现出的商业资本运动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最荒唐的看法莫过于把商人资本——不管它以商品经营资本的形式或货币经营资本的形式出现——看做是产业资本的一个特殊种类<sup>⑤</sup>。专制主义并非是独特的生产方式，不能将其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论和“专制主义”论者，都机械地援引波克罗夫斯基以及波格达诺夫、拉狄克等人的理论填充中国史实，把“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和“专制主义”社会作为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期”，这样就无端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两千多年的“过渡期”。中国的商业发达与“商业资本主义”是两码事。“商业资本主义”理论与秦汉以后王朝推行“重本抑末”很难贯通。“商业资本并不是历史的创造主，而王、胡两先生偏要以商业资本来解释社会的演变，这无异又以自己来作自己的否定者了。”<sup>⑥</sup>“商业资本主义”论和“专制主义”论者最后大多都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例如胡秋原自述其“专制主义”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修正”，并自评早年的研究是“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公式中翻筋斗，而不问马克思的公式及其方法有无根据”<sup>⑦</sup>。

### 三、苏联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态度与其中国回响

新中国建立之初对苏联史学的介绍和学习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以及

① [苏]波克洛夫斯基：《关于俄国封建主义专制主义之起源及特质》，王礼锡译，载《文化杂志》1933年第2期。

② 王礼锡：《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载王礼锡、陆晶清编：《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

③ 胡秋原：《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载王礼锡、陆晶清编：《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

④ 胡秋原：《胡秋原政治文艺哲学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1页。

⑥ 何干之：《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页。

⑦ 《胡秋原选集第一辑——文学与历史》，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78～179页。

历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消极因素。

1928～1934年是苏联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而斗争的时期，这一时期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在史学界占据支配地位。1934～1941年间，波克罗夫斯基学派遭到了批判和清洗，斯大林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唯一解释者。

苏联对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批判，开始于历史教学领域。波克罗夫斯基把具体的、活生生的历史事实与社会发展形态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了后者，造成历史学的公式化、抽象化与教条化，“脱离历史环境而抽象地、学究式地看待历史现象并贴上抽象的‘标签’，一般说来，本是波克罗夫斯基‘学派’所固有的特点”<sup>①</sup>。当然，这种现象的成因，可能与波克罗夫斯基在十月革命后专注于行政事务对史料研究不够深入有关。在历史教学领域中，以社会形态的抽象公式代替具体历史的做法，很容易造成教学上的混乱，把历史课当成是政治课来讲授，为此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于1934年5月16日发布了《关于苏联各学校中教授本国史》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本国史的教学中，不是采取生动活泼的方式和依照年代次序叙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的特点，而是向学生讲授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这样就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了本国历史的系统叙述。”<sup>②</sup>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概括与社会形态演化过程及其阐释的一门科学，历史学讲的是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情况，两者虽然密切关联但也决不能以前者代替后者。千篇一律地讲历史公式，却抛开了各个具体时代的历史特征，给学生留下的只是空洞死板的公式和教条，这种教学显然不适应历史教学实际。

《关于苏联各学校中教授本国史》决议对新中国的历史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小学历史教学领域里也存在着公式化、教条化的倾向，“一些教员发生过把历史讲成政治课，忽略系统讲授史实的偏向”，不涉及具体的历史事实，这样就使学生对中国的历史认识模糊不清，直接违反了历史教学的基本要求。对这种偏向的纠正，就是“参考苏联的经验，知道要使学生熟记重要的史实、人物、年代”<sup>③</sup>。20世纪50年代中国编译了苏联学者卡尔曹夫的《小学历史教学法》、《中学苏联历

史教学法概论》等有关历史教学法专著，都特别强调了1934年的《关于苏联各学校中教授本国史》决议。高校的历史教学也是如此，尚钺肯定“编写或讲授本国史，偏重于一般规律的指导原则是对的，正确的”，但是“用抽象的社会学的公式，来代替客观的历史认识，代替对史料的研究，这就障碍了根据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叙述本国历史。公式主义地偏重一般规律，对发展马列主义的历史科学和提高我国的历史教学，不仅无益，而且是有害的”<sup>④</sup>。金毓黻同样也认为历史理论必须与人类历史的具体进程相结合，“提供给学生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而不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和按年代的次序，讲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底特点等，以教授本国史，这样，就以抽象的社会学的规式代替了本国史有系统的讲述”<sup>⑤</sup>。参照《关于苏联各学校中教授本国史》决议，新中国不少从事社会形态研究的历史学家也被误认为是“波克罗夫斯基学派”<sup>⑥</sup>，他们的研究是“犯了波克罗夫斯基的错误”。

但是，由历史教学领域整顿而引发的对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的批判最后演化为肃反运动，波克罗夫斯基的史学研究被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取消主义”。随着运动的深入，肉体上的镇压取代了思想上的批判。波克罗夫斯基的名字被从苏联史学中抹去，他的许多学生被冠以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暗害分子、恐怖分子或间谍的罪名被大批处死<sup>⑦</sup>。波克罗夫斯基此时虽已亡故，但仍然被说成是他们的总头子和组织者。苏联在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的同时，“利用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批判来作建立斯大林在历史科学中统治地位的根据”<sup>⑧</sup>。

20世纪30年代苏联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批判运动也传到了中国，盛岳编译的《史学新动向》（上海

① [苏]涅奇金娜：《关于“最小祸害”的公式问题》，载《苏联历史论文选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96页。

② [苏]潘克拉托娃等：《反对波克罗夫斯基历史观点》，陈启能、李显荣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页。

③ 教育资料丛刊社编：《中学历史教学的改进》，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版，第5页。

④ 尚钺：《关于编写与讲授本国史的指导原则》，载《新建设》1951年第5期。

⑤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896页。

⑥ 《翦伯赞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9页。

⑦ 陈启能：《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242页。

⑧ [苏]纳伊金诺夫：《波克罗夫斯基和他在苏联史学中的地位》，载《外国学术资料》1962年第6期。

杂志公司1936年版)辑录了苏联领导人有关历史问题的言论,第一章和第二章便是拉狄克和布哈林对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批判,吕振羽在该书的“序”中认为此书在消极方面“清算了包克罗夫斯基学派”,在积极方面则是确立了“一个更高阶段的史学研究的指导原则”。重庆《理论与现实》杂志刊载的《概评朴克洛夫斯基历史理论》(原载1939年11月12日《真理报》)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史学思想、方法以及其对俄国历史的具体论述,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号召“利用最彻底的手段去消灭M.N.朴克洛夫斯基历史‘学派’一切的遗产,揭穿朴克洛夫斯基著作中最重大的错误”<sup>①</sup>。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史学受苏联史学影响极大,大量编译介绍苏联的史学理论与研究实践。对于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的态度仍然是依据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结论,将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学派<sup>②</sup>。在“以俄为师”的指向下,20世纪50年代波克罗夫斯基在中国的形象只是一个“取消主义的和反科学”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鲍克洛夫斯基学派伪装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但在实质上他们的目的却是取消历史科学”<sup>③</sup>。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史学观点和方法都与马列主义相冲突,与历史发展的规律相违背,“包克罗夫斯基学派……仅只运用了经济唯物论,并没有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他们工作的武器”<sup>④</sup>,波克罗夫斯基学派最终成了苏联史学发展的绊脚石,“包克洛夫斯基学派的毒害,就是这样在斯大林亲自领导下,用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步将其清除的”<sup>⑤</sup>。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上述言论正如顾颉刚所言:“今日何有是非,惟跟苏联走耳。”<sup>⑥</sup>对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批判,由学术批评上升为政治运动,对新中国的历史学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开始逐步清除斯大林模式对历史学的负面影响,到苏共二十二大苏联正式为波克罗夫斯基平反,“恢复波克罗夫斯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名誉”,当然也“绝对不意味着应当掩饰他的各种错误,或者回到这位学者的科学知识的水平上”<sup>⑦</sup>。苏联《历史问题》1962年第3期发表杜勃罗夫斯基的《波克罗夫斯基院士和他在苏联历史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学术进行全面系统客观的评价,肯定了波克罗夫斯基的功勋在于“力求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科学的学说,来证明历史过程的规律性,证明历

史过程首先受客观经济因素的制约,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对于波克罗夫斯基的错误必须放置于其所处的时代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且波克罗夫斯基本人也积极用自我批评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错误并竭力纠正这些错误,“在他的探索中,反映出了对于本国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逐渐形成的过程”<sup>⑧</sup>。

十月革命后,波克罗夫斯基站在阶级立场上对俄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持基本否定态度,其表现之一便是不顾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具体历史背景,用教条的公式去套,这当然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从历史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从当时的标准出发,否则,那历史将无是非可言。但是20世纪30年代在对波克罗夫斯基进行批判的同时,却将其史学遗产中的合理部分也一概抹杀,在对历史人物评价中某些不正确的倾向开始出现,人民群众的作用被缩小,沙皇公爵等王公大臣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被理想化,尤其是斯大林对伊凡四世、彼得一世这些强力人物以及集权专制的情有独钟,更滋长了这一倾向。伴随着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加深,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了粗暴的践踏和破坏。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争论,在中国也同样存在,成为贯穿了新中国历史学的一条主线。波克罗夫斯基曾对沙俄的侵略扩张进行过揭露和批判,但是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批判又滋长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突出表现在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并入苏联的问题上,“由于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极其有害的影响,这个问题解决得并不正确。有些阐述中亚历史著作的特点是:片面强调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sup>⑨</sup>。苏联理论界和学术界

① [苏]耶洛斯拉夫斯基:《概评朴克洛夫斯基学派历史理论》,焦甘霖译,载《理论与现实》1940年第1期。

② 《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历史问题〉1935年第11号社论》,载《史学译丛》1954年第1期。

③ 朱庆永:《苏联在历史科学上的重要贡献和成就》,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

④ 朱庆永:《三十四年来苏联历史科学的发展》,载《新建设》1951年第2期。

⑤ 余绳武:《向苏联历史科学工作者学习》,载《大公报》1952年12月9日。

⑥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7卷,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版,第352页。

⑦ 《苏联历史学家根据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讨论科学任务》,载《苏联历史论文选辑》,第1册,第92页。

⑧ 《苏联〈历史问题〉杂志载文重新评价波克罗夫斯基》,载《外国学术资料》1962年第1期。

⑨ [苏]勃拉金斯基、拉扎鲍夫、罗莫金:《论中亚细亚并入俄国的意义问题》,载齐世荣等:《苏联历史论文选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07页。



开始为沙俄的掠夺政策作辩护。但在为波氏平反后，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也未有更改，例如《俄国历史概要》中便将有关沙俄对中国边疆侵略的内容删去。

一般认为，苏共二十大引发的中苏分歧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1960年开始，中苏在历史学领域里的矛盾就逐渐显露出来。苏联史学界在重新评价波克罗夫斯基的同时，致力于清除个人崇拜在史学研究中的影响，再次肯定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这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以及中国国内的社会环境下都不可能获得积极的回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批判波克罗夫斯基时曾出版过《反对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观点》（1939年）和《反对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1940年）两本论文集，都可以看做是斯大林时代个人崇拜的产物，在学术和理论上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二十多年后，三联书店却从上述两本论文集中编译出版了《反对波克罗夫斯基历史观点》，收入了潘克拉托娃、雅罗斯拉夫斯基以及福赫特的三篇批判论文，显然是国内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大背景下的产物。而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苏联史学的研究和对波克罗夫斯

基的评价，则被看做“资产阶级学者”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历史学”表示欢迎<sup>①</sup>。

“文革”结束后中国历史学开始拨乱反正，中国对波克罗夫斯基的介绍和评价也开始趋于客观和公正，三联书店1978年编译出版了《俄国历史概要》，肯定了波克罗夫斯基是苏联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对波氏早年的革命活动经历以及学术成就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但却未提及30年代对波氏的批判。陈启能《三十年代苏联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批判》一文详细叙述了30年代苏联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批判经过，陶惠芬的文章《评波克罗夫斯基的商业资本理论》则重点分析了波氏有关商业资本的错误。波克罗夫斯基本人的史学成就及其失误，苏联对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批判以及后来的平反，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社会主义国家曲折发展的历程，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学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以及中国史学的进步和繁荣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 李淑华）

<sup>①</sup>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论苏联历史学》，吕浦、黄巨兴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页。

## Pokrovsky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ZHU Cien

**Abstract:** Pokrovsky was the founder of Soviet history and the historian who was the first to use the stand and method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re-comb and interpret Russia history. He made major contributions to establishing proletarian historiography guided by Marxism, training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Soviet historians and organizing the proletarian historiography team.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his historiography works were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h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as also spread in China. The commercial capitalism and despotism he proposed became important concepts in the course of the controversy of Chinese history and had a certain influence upo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mmercial capitalism; despotism; political criticism